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尋求學術研究與政策分析平衡的中國研究：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志業

Chinese studies in search of a balance between policy and academic research: objectives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Affairs at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30402/EAS.201812_49(2).0004

東亞研究, 49(2), 2018

East Asia Studies, 49(2), 2018

作者/Author：王信賢(Wang, Hsin-Hsien);趙春山(Chao, Chun-Shan)

頁數/Page：83-11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8/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402/EAS.201812_49\(2\).0004](http://dx.doi.org/10.30402/EAS.201812_49(2).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airiti

尋求學術研究與政策分析平衡的中國研究：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志業

**Chinese studies in search of a balance between
policy and academic research: objectives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Affairs at Chengchi
University**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 王信賢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趙春山

Wang, Hsin-Hsie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ao, Chun-Shan
(Honorary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at Tamkang University)

Chinese studies in search of a balance between policy and academic research: objectives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Affairs at Chengchi University

Wang, Hsin-Hsie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ao, Chun-Shan

(Honorary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at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For the past fifty year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has been a key contributor to Mainland China studies nationally. The institute w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as an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focused predominantly on Mainland China and kept separate from academic research. Its founding purpose was to “cultivate individuals for the struggle against communist thought,” and while hidden within in an academic institution, it was at the same time tasked with policy research. As such, this paper shall examin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Affairs, in bo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and policy research and between area studies and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shall also identify challenges facing the institute as an institution of China studies in Taiwan, including a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think tanks, the difficulties of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policymakers,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field to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standpoints.

Keywords: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Affairs, China studies, academic research, policy analysis, think tanks

尋求學術研究與政策分析平衡的中國研究：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志業

王信賢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

趙春山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

摘 要

五十年以來，東亞所一直是國內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重鎮。創所之初，其一方面為以中國大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區域研究所，與專業學科的研究一直有所區隔；另一方面又以「培養反共思想鬥爭的人」為創所目的，故雖隱身在學術機構，卻是肩負著政策研究的使命。基於此，本文將從學術與政策研究、區域研究與專業學科間的關係，探討東亞所的發展與變遷。此外，本文也點出東亞所乃至台灣中國研究所面臨的挑戰，包括專業智庫的不足、培養政策人才不易，以及此領域容易受政治立場影響等。

關鍵詞：東亞研究所、中國研究、學術研究、政策分析、智庫

壹、前言

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曾在二十世紀初發表關於「政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與「學術作為一種志業」（Science as a Vocation）兩場著名演講，深入分析學術知識與政治行動的性質、條件與限制，後也成為其傳頌一整個世紀的經典著作（Weber 2014）。關於學術與政治的分野，韋伯所指的對象雖屬個體層次，然而就組織層次或整體學科發展而言，仍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就此，本文將從下列兩個相關聯的面向進行討論：一是「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的性質，另一則是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以下簡稱「東亞所」）創所初衷與演變。

就第一個面向而言，不論從歷史或實際政治經濟發展來看，中國大陸對台灣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而「中國研究」對台灣學術界而言當然也具有不同的意義；甚至有學者主張，由於中國本身發展歷程的特殊性，再加上其對台灣的重要性，「中國研究」確實可以成為一門與政治學、經濟學或社會學等專業學科等量齊觀的「中國大陸學」（李英明 1995）。然而，如同吳玉山教授所言：「大陸研究與兩岸關係對台灣是生死攸關的大事，研究者需要懷於本身的使命，提醒大眾的注意，喚起政府的重視。台灣的大陸研究禁不起抽象的空談，而需要有實用性。」（吳玉山 2017）就此而言，「中國研究」對我國而言，不僅僅是學術研究，且是重要的政策研究。

就第二面向而言，身為國內中國大陸研究最具傳統的政大東亞所，其發展也和大環境緊緊相扣。東亞所雖設置於大學之中，但從創立之初就負有政策任務，如其官網所介紹：「民國56年2月14日，先總統 蔣公召見本所創所所長吳俊才先生時，面示創辦本所，由國立政治大學與改制前之『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合作

設立，目的是培養反共思想鬥爭的人才，分門別類研究共黨問題，有系統的整理和出版有關資料，並聯繫國內外的學者專家。」¹可見東亞所的設立具有極高政治意涵，但隨著時間的推演，其政策色彩逐漸淡化，逐漸走向「學術研究」，然卻也因歷史遺緒與傳統而與政策研究分不開。

本文有兩個主軸：以「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關係為主、「區域研究與學科研究」關係為輔，探討東亞所創所迄今的發展與變遷。除在文獻上探討前述兩關係外，本文也訪問了三位曾在政府部門或熟悉我國大陸政策決策過程的所友，以其親身經驗說明學術與政策研究間的平衡，以及東亞所在此方面的發展與挑戰。

貳、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的對話

1950年代行為主義（Behaviorism）盛行，政治學乃至於整個社會科學界為了讓研究更為「科學」，便以自然科學的研究策略和目標為學習的典範。Gabriel Almond與Stephen Genco（1977）在一篇名為《雲朵、時鐘與政治研究》（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的文章中則提出反思，其中，時鐘代表規則、可預測性與精準，也就是「學科」的要求；而雲朵則意味著變化萬端、無一固定型態，用以形容現實政治。換言之，政治學研究往往會在「學科要求」與「現實政治」間抉擇。同樣地，學科研究與區域研究間的張力亦復如此。

就此觀之，研究大致可分為政策導向研究與學術導向研究兩種，有學者甚至提出雙社群理論（two-communities theory），強調

1. 參考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網站：<https://eastasia.nccu.edu.tw/intro/pages.php?ID=introl>

學術研究者與政策制定者兩個社群是處於迥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且各有不同的價值與態度（Caplan 1979）。比較兩者，至少有以下區別：

就目的而言，政策導向研究是為了在決策、執行與評估等政策過程提出建議，也就是透過研究獲得研究結果，據此提供意見以解決政策問題或作為政策制定的參考依據；而學術導向研究的研究目的則是為了知識生產及知識創新，或經由研究來滿足研究者的研究興趣並累積學術資本。以國際關係研究為例，學術研究通常探討世界觀或政治哲學層面的論題，將具體的國際問題作為個案來研究，目的是為了達到理論上的抽象或總結出國際政治的科學規律。而對於國家外交部門或決策機構面臨的許多具體問題的研究，尋找出對策方案，則往往指向政策性研究。由於一個國家所面對的具體國際問題變動不居地變換，這類研究若不是抱有影響政策的目標，可能很快就會失去價值（Walt 2005）。

其次，在研究產出時效方面，政策研究由於涉及政策實施或檢討的時效性，較學術研究所需的時間更短，學術研究可以多次修改到作者或審查人滿意為止；但政策研究則無法如此。再者，也正因時效性，兩者在使用的語言與邏輯推演方面也有所不同，學術專業術語是學者彼此交流的共同語言；但這些專業術語缺乏一般性與通俗性，因此當這些學者的理論放到政治圈時，往往使得學術界與政治圈的溝通產生落差；而政策研究也不像學術研究需歷史背景描述與詳細的邏輯推演，多僅需政策的研析與建議。

最後，兩種研究所在的機構有著極大的差異。一般而言，政策研究者多任職於智庫（think tank），而學術研究者多任職於大學或研究機構。以美國為例，智庫為一種相對穩定且獨立運作的政策研究和諮詢機構，其具有獨立性、非營利性、從事政策研究以

及以影響政策為目的等特性，往往被認為是橋接知識與權力的重要機制（Stone 2007; UNDP 2003），也被稱為「沒有學生的大學」（university without students）（Weaver 1989）；然而，智庫與一般大學有著極大的差異。曾擔任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系教授、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兼中國中心主任，且於1998年至2000年間擔任國家安全事務總統特別助理兼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局資深主任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即提到：

我發現在美國重要的研究型大學，歡迎學者做研究，得出有意思的結論，出版研究成果，但坦白地說，他們並不關心這些成果對決策或對世界產生哪些影響。他們所要的是產生新知識；而布魯金斯學會則希望研究者產生新的理解，並使這些理解在世界上產生影響，對中國、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政策產生影響。

此外，不少觀察家已經注意到學術工作者與政策研究者間的認知差距正在日益增大。Joseph Lepgold和Miroslav Nincic（2001）認為，近年來學者和政策研究者及政府官員間的專業性鴻溝大大加深，許多學者不再嘗試走出象牙塔，這些實際政策參與者也將會越來越忽視他們。Bruce Jentleson（2002）也提出類似的看法，其認為問題不僅是理論和政策間存在差距，而是這一猶如斷層般的鴻溝近年來在日益加大。針對此一問題，中國大陸國際關係學界也提出深刻的反省。知名學者王緝思（2009）即於「國際政治研究」組織一期關於「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的專刊，其中有學者甚至呼籲「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王棟 2009）。

就此而言，我們發現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似乎有所差異，但其間是否真具有不可調和的衝突？能否於其中尋求平衡？以下我們將就這些問題觀察東亞所的使命與發展。

參、帶有智庫性質的學術研究機構

超過半個世紀以來，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中國研究，受到國際政經格局、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典範、美國國內學術資源分配，以及中國政經制度變遷等的影響，歷經了不同階段的變化，也產生方法論典範的轉移（Shambaugh 1993; Walder, 2004; 王信賢 2000）。而台灣中國研究的發展與美國當代中國研究的建立類似的，受到國際政治、兩岸關係以及台灣政治發展的影響甚深，從早期的「匪情研究」（1949~1978）、中期的「大陸研究」（1978~1992年左右），到「當代中國研究」（1992~）等共可區分為三個階段（楊開煌 2000; Kou 2014）。而東亞所從創立迄今，我們都可以發現其與台灣中國研究的命運與大陸政策關係密切，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看出，東亞所的教師或所友，不論是實際的政策制定亦或是參與政策研究，基本上是學術機構與智庫的「有機結合」。

一、東亞所創設目的

如前文所述，東亞所成立的目的是「培養反共思想鬥爭的人才」。在褚填正（2017, 35-196）書中的訪談記錄可發現，國民政府來台之時，關於共黨與大陸問題的研究僅限於情治與軍事單位，除了這類單位培養少數相關人才外，沒有一個學術機構有計畫、系統性地培養大陸研究專家，導致形成研究梯隊的斷層。因此吳俊才先生1967年向層峰建言，應迅速成立一個培養對敵鬥爭高級理論人才的研究所。並在蔣中正總統與蔣經國先生指示下成立東亞研究所。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前身）與東亞研究所間的關係極為密切，國研所是政府的重要智庫，專門負責國際與大陸問題上提供建言予政府參考，國研所為研究單位，東亞所則為教學單位，早年在東亞所表現傑出的研究生，日後可在國研中心實習，

甚至畢業後可進入國研中心擔任研究工作。

劉曉鵬（2013）也指出，背後是國家最高領袖與國家安全局的政大東亞研究所，自然是為國家安全而培養人才，故「不能走一般大學之學術道路，我們要培養品學兼優，且富國家觀念之革命人才」。也因如此，考取的學生除須注重學科分數外，還須通過調查局安全查核。東亞所的位置與「國際關研究所」在一起，而非位於政大的木柵校園，初於台北市區內的公企中心，後於指南山下授課，充分顯示其特殊性。故東亞所的創立與國家的命運分不開，本文一位受訪者即指出：「從東亞所創立的歷史，由蔣經國要求吳俊才先生創立專門培養『反共思想鬥爭人才』的研究所就可知道，東亞所不只是學術研究，也包括政策研究，甚至是對重大政策的參與。早期東亞所學生畢業，吳俊才老師都會協助、分配同學的工作，包括國民黨、政府、研究單位與媒體等。」²

二、大陸情勢研析

在前述「匪情研究」階段中，由於具有強力的政策任務，研究對象多以中共高層政治為主，常見的議題是屬於「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的精英政治、黨史、意識型態、解放軍與外交等，主要研究方法是歷史研究或個人經驗推斷，是一種「看照片、猜測、閱讀秘件」的方法，研究機構、社群主要為與黨國關係密切的人員，或國家成立的研究單位，其研究目的乃是「敵情研究」。而由於研究者多側身於黨政研究機關中，研究對象以中共中央政權為主，由於國民政府過去和中共有長期鬥爭的經驗，因此掌握了一批難得的歷史文獻，又有情報單位在敵後蒐集資料，以及許多研究員個人親身經驗，因此特別專長於意識形態、中共黨史和中共的派系

2. 作者訪談，受訪者A，2018年6月28日。

鬥爭，也因此對中國大陸實際政治發展的情報判斷也特別精準（吳玉山 2000）。

針對此，一位受訪者也指出：「東亞所的教育是『共產黨的觀點看共產黨』，用共同的語言（same language）更容易溝通，也可增加彼此互信，理解會更深入，這都有助於政策研究。最重要的是，這套訓練讓我們可以區辨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中共所宣傳的。」³其又提及：「對中國大陸重大事件的研判，東亞所一直都是最準的，包括早期老師輩如郭華倫老師等對『文革』是政治鬥爭的判斷，或是後來對『六四事件』、『九六台海危機』的判斷都是。當初對於中共會如何應對、採取何種行動都經過沙盤推演，事後證明很準。甚至也都參與了大陸政策文件或總統講話的撰寫。」⁴

三、政策參與

而與前述相關的則是對政策制定的實際參與，從時序來看，東亞所的老師或所友在不同時期均發揮重要的政策影響力。東亞所在各任總統時期一直跟實際的大陸政策高度相關：

（一）「兩蔣」時期：東亞所前幾期學生，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還都一一召見，除研究成果配合「國際關係研究所」之外，當時課程的安排與講師，除了原本做「匪情研究」的之外，也請政府官員來上課。根據曾永賢教授在「從左到右六十年」一書中所述：「台灣的『匪情教育』是從1968年成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開始，從第一期開始本人就擔任兼任教授。東亞所創立初期亦邀請在政府部門表現優異的官員擔

3. 作者訪談，受訪者A，2018年6月28日。

4. 作者訪談，受訪者A，2018年6月28日。

任兼任教授，如當時在『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工作的李登輝前總統，由於農業經濟專長被延攬至東亞所授課，兩人也因此結識。」（曾永賢 2009, 189）

- (二) 李登輝時期：1988年初李登輝繼任總統，六、七月間在學術界成立四個研究小組，包括政治組、經濟組、外交組以及大陸組等，大陸組由畢英賢擔任召集人，成員有趙春山、曾永賢、吳安家、趙先運、張榮豐等（曾永賢 2009, 222），其中大陸組的成員基本上都是跟東亞所有關。而在此時期，不論是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副秘書長張榮豐，或國民黨中央大陸工作會主任張榮恭等，都是東亞所所友。甚至與對岸某些「管道」的建立，也都是透過本所所友。
- (三) 陳水扁時期：此一時期主要是透過重要的智庫，如「中華歐亞基金會」作為主要的決策依據與參考，其中「歐亞」的主要成員也是以東亞所所友為主，雖屬「參贊」性質，但對政策還是很有影響力。
- (四) 馬英九時期：這時期東亞所更多人協助馬政府處理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如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兩任負責大陸與兩岸情勢的諮詢委員都是東亞所的，也包括擔任陸委會副主委的趙建民。而在2015年11月所舉辦的「馬習會」更不用說，坐上談判桌的國安會諮詢委員邱坤玄、幕後運籌帷幄、時任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的趙春山，以及負責與媒體專業溝通的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張五岳教授等，都是東亞所老師或所友。⁵

5. 作者訪談，受訪者A，2018年6月28日。

四、歷史資產與意義

如前所提台灣中國研究的三個階段，到了第二與第三階段的「大陸研究」和「當代中國研究」，從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角度而言，中國的改革開放、兩岸關係張力的緩解、社會科學典範的移轉以及學術人才的世代交替等，都使得台灣中國研究的研究議題、研究方法或研究社群發生轉變。首先在研究議題方面，隨著鄧小平南巡後中國更加開放，兩岸關係趨於和緩、交流加速，使得與中國相關的資訊愈來愈容易取得，此時期的研究範圍不僅從中央層次到地方層次，研究議題也從「國家中心」擴增至「社會中心」。其次，大量的歸國學者加入研究行列，研究方法以西方社會科學為主，開始運用田野調查以及量化統計，研究典範則多追隨美國學術界潮流。最後，各大專院校開始成立相關研究所，各專業學門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與法律等也開始加入中國研究行列，使得中國研究成為「顯學」。換言之，台灣中國研究開始從「政策研究」轉向「學術研究」。

東亞所的發展當然不可能置身在此潮流之外，從過去「獨佔」到競爭者劇增，從主要集中在中共黨史、意識形態教育到社會科學研究，更多元研究方法的引入等，都讓其承受更大的壓力。然而，正如陳至潔（2016）所言，過去包括對中共政治菁英的人格與其社會背景的分析，以及對中共派系鬥爭與高層政治人事更迭的關注與解釋，此部分在「匪情研究」學術化的過程中被保留下來，成為台灣下一代中國研究學者的必修課程。這多少也可以解釋為何在冷戰過後、已經民主化的台灣，其中國研究學者仍舊比他們的西方同行更為關注中共黨史、中共意識型態變化、以及中共政治菁英選任過程等特定研究議題。可以說，冷戰時期台灣的知識權力關係仍然明顯地建構了現今吾人所強調具有「台灣特色」的中國研究典範。

除此之外，東亞所對大陸的深入瞭解，也有助於其與大陸學界、智庫的交往。根據陳德昇與陳欽春（2005）的研究，其透過大量的問卷調查後顯示，兩岸學術交流成效之良窳，主要的關鍵在於交流網絡的結構與相互信任的建立，而「網絡」與「信任」這兩項重要的學術交流評估指標，正是當代社會資本理論闡釋人類社會互動的實質內涵，也是兩岸營造共同利益的基礎建構。此外，在「交流方式評估」方面，「蹲點研究」的實質效益最受學者專家的肯定，而「交換教授或邀請講座」也是務實交流重要方式。

事實上，不論是關係網絡或是「蹲點」都是東亞所的強項，一位受訪者提到：「關於大陸的『基礎知識』以及『兩岸互動』都是東亞所最擅長的，也是過去遺留的資產，不論是對學術或政策研究都有幫助。」⁶而另兩位受訪者也不約而同、更具體提及：「黨史、意識形態是最基礎的，可以抓到中共的真實面，另外就是實際的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東亞所與大陸的交流也是最早的，現在大陸很多資深的涉台人士一開始都是東亞所邀請的。很多大陸涉台人士也都一再說，『還是東亞所較了解我們』，這是有道理的。」⁷

肆、東亞所與台灣中國研究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如前所述，東亞所過往在政策研究方面有其優勢，但在1990年代台灣中國研究向學術研究轉型過程中，卻也面臨諸多挑戰，其中不僅是東亞所本身的問題，也涉及區域研究的性質、學術環境與評價標準等因素。故在政策研究與學術研究結合或平衡方面，我們

6. 作者訪談，受訪者C，2018年7月18日。

7. 作者訪談，受訪者A，2018年6月28日。作者訪談，受訪者B，2018年6月27日。

認為有以下需要加以省思。

一、區域研究與學科專業間的張力

對東亞所這類區域研究所而言，「區域研究」與「學科專業」間的張力一直是長久存在的問題，如同《雲朵、時鐘與政治研究》一文所述，學科專業所要求的是規則與可預測性，然而區域研究所著力的是對研究對象系絡的深入了解以及發展動態的掌握（Almond and Genco 1977）。學科研究感興趣的往往是理論問題，研究對象作為一種個案，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分別對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議題感興趣，以此來回答學科的理論問題，中國為一研究個案，藉以支持或批判學科理論；而對區域研究者而言，其可能更關心「中國」本身的發展動態，並透過中國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科際整合」予以解釋，兩者的要求與追求的目標顯然有些差異。

關於此，Kevin O' Brien（2011）在反思美國中國政治研究後認為，在美國的中國政治學研究中有兩種趨勢，其一，學科定位在不斷增強，尤其是年輕學者，中國政治研究和其他區域政治研究一樣，幾乎都被合併到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係領域，回答的問題多不是區域的問題，而是理論的問題。其二，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傾向於選擇相對狹小的課題，也缺乏將其研究發現與政治體制運作結合起來。此種學科專業化有著令人擔憂的後果，包括不鼓勵跨學科的以中國為中心的討論，形成一種被新的學科術語和狹窄的關注點所隔離的研究孤島（Islands of research），其不僅抑制跨學科的研究，也阻礙我們對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形成整體認識的努力。

此外，這也涉及到研究方法的採用，Lieberthal（2010）即認為，早期美國政治學者所受的學術訓練很傳統，即大量閱讀相關資

料，然後找出自己感興趣、試圖回答的問題，幾乎不用當下在美國政治學界頗為盛行的模型、博弈論、統計等研究方法。而現在很多年輕學者、學生他們研究一些不太重要，但卻可運用複雜的研究方法的問題，這使得美國政治學界培養的研究者過於強調方法，而缺乏對中國宏觀且深入的了解。

就此看來，區域研究與學科研究間確實存在張力，對教學機構而言最重要就是體現在課程上，過往東亞所課程包括中共黨史、意識形態，以及諸多選修課程也多是與中國大陸為核心的相關課程。事實上，東亞所之所以以此為名，除了當時政治氣氛外，還有其他考量，一位受訪者提及：「創所之初東亞所不只做中國大陸研究，也做中國大陸周邊國家區域研究，包括印度、東南亞以及俄國，創所所長吳俊才強調也必須從周邊的區域來看中國大陸，這樣才會看得更清楚。」⁸

事實上，東亞所在1980年代就開始意識到要從過往的中共研究轉向社會科學，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做法是鼓勵老師出國留學，吸收更新、更多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以本文作者之一趙春山教授為例，當時政大歐陽勛校長同意其留職留薪兩年，再加上國科會（現科技部）給予兩年補助總共四年到美國喬治城大學，所學的就是「比較共產主義」，以及如何把社會主義國家研究理論化的問題，回到東亞所後接任所長後，增加東亞所三方面的課程，第一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第二是比較政治研究，第三是共黨國家的社會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東亞所後來會有中國大陸社會相關課程的原因。此外，從課程上來看，東亞所也強調從中國傳統文化看中國大陸的發展，所以有不少跟中國文化相關的課程，甚至聘請錢穆、陶希聖等大師來開設相關課程。就此而言，東亞所對學生的訓練以對

8. 作者訪談，受訪者A，2018年6月28日。

中共黨史、意識形態為主，並結合了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周邊國家研究，再加上中國的傳統文化，透過多方面了解中國大陸的發展。

就目前而言，作為區域研究所，認識研究對象乃是基本功，以碩士班為例，「中共黨史」依然列為必修課程，為全局性認識大陸，其他「群修課」包括「中共政治發展」、「中共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中國大陸社會轉型與變遷」、「中共對外關係」以及「兩岸關係：理論與實務」等，然而，為適應學科發展，「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則列為必修，此外，目前許多課程是試圖平衡「學科專業」與「中國現況」的，例如：「中國大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專題」、「國家理論與中國研究」、「組織理論與中國研究」、「新制度主義與中國研究」、「比較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大陸研究」、「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共外交」、「比較政治與中國政治」、「國際關係與中國對外政經發展」與「跨國主義與中國大陸的人權」等。兩位受訪者也同時提及：「東亞所由於沒有大學部，我們的學生來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各學科訓練都有，上課常常因此這激盪出討論的火花。」⁹

就次而言，東亞所課程的安排致力於平衡學科理論與區域發展，一方面能從學科的理論關懷觀察中國大陸發展，另一方面也能將中國大陸的發展反饋、檢視理論的適用性，有助於學生同時理解學科理論與中國大陸現實。

二、學術研究 vs 政策研究

在論及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的平衡時，身在學術機構的我們應要問的是「何種研究較能解決政策問題？」根據一份針對十個國家、2,700多名從事國際關係研究與教學的學者所做的調查，將

9. 作者訪談，受訪者A，2018年6月28日。作者訪談，受訪者B，2018年6月27日。

國際研究進一步區分為理論分析、量化分析、政策分析、區域研究、歷史個案研究、當代個案研究與形式模型等，其中一個問題是關於「國際關係研究對政策制定者是否有幫助」（Jordan, Maliniak, Oakes, Peterson, Tierney 2009）。

從下表中我們可發現，縱使在個別國家「政策分析」與「區域研究」對政策制定者的助益各有高低，但整體而言，「區域研究」是高於理論與方法研究，甚至也高於「政策分析」，此外，「當代個案研究」亦獲得諸多研究者的肯定。這可以說明，研究者在「區域研究」與「當代個案研究」的客觀分析往往可以獲得決策者的重視。此外，理論與量化分析影響有限，而其中形式模型幾乎被所有國家研究者公認對政策最沒有幫助的。但這恰恰也可以反映出當前學術與政策間的鴻溝，一般學科專業期刊往往對理論、量化與形式模型相關的研究感興趣，而在學界其評價亦較高，而區域與個案研究則反之。

表一 不同類型國際關係研究對政策制定的作用

類別	所有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伊朗	以色列	沙烏地	香港	新加坡
理論分析	1.40	1.41	1.33	1.31	1.55	1.48	1.57	1.64	2.00	1.43	1.44
量化分析	1.64	1.62	1.68	1.61	1.76	1.60	1.75	1.50	2.00	1.29	1.69
政策分析	2.28	2.30	2.18	2.24	2.48	2.32	2.13	2.29	2.44	2.20	2.19
區域研究	2.31	2.36	2.23	2.15	2.38	2.50	2.04	2.23	2.67	2.07	2.06
歷史個案研究	1.85	1.89	1.76	1.75	1.86	1.67	1.42	1.85	2.11	1.87	1.56
當代個案研究	2.22	2.23	2.16	2.18	2.33	2.43	1.92	2.23	2.33	2.07	2.19
形式模型	0.97	0.97	0.95	0.82	1.10	0.86	1.25	1.00	1.78	0.71	0.94

註：非常有幫助=3，有點幫助=2，不太有幫助=1，完全沒幫助=0

資料來源：Jordan, Maliniak, Oakes, Peterson, Tierney (2009)。

然而，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間是否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Kenneth Lieberthal (2006) 即認為，學者可以對研究對象國家的背景資料、政府菁英人事相關的網絡以及語言等各方面提供決策部門

參考，亦即良好的學術研究能提供有「附加價值」的見解，當然學術研究的成果必須要與具體問題相關聯，並提出具有解決問題的方案方能對決策者產生影響。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決策者若希望制定出更好的政策，也需要提供機會以便從感興趣的學者提供的東西中獲取教益。理論素養可以使得政策研究的學者們變得更加「聰明」，因為理論是政策觀察者或制定者可以掌握的「路線圖」（朱峰 2009）。就此而言，學術與政策間的矛盾並非不能調和，培養具有良好學術訓練和理論修養，具備清晰邏輯思辨和分析能力的下一代決策者，是可以彌補學術與政策鴻溝的（Nye 2008; Goldman, 2006）。

就此觀察東亞所，如前所述，東亞所老師、所友在政策界表現有目共睹，除直接參與政策規劃與制定外，一位受訪者提及：「東亞所這個系統出來的以各種方式提供政府政策建議，包括擔任政府部門相關委員會之諮詢委員（如陸委會諮詢委員）、參加政府或智庫的政策諮詢，抑或透過媒體發揮影響力等都是。」¹⁰而還有一種方式就是直接進入官僚體系，一位受訪者說到：「我在任內幫忙協調、啟動『高考二級兩岸組』，中間經過多少折衝，現在也看到一些成果，很多東亞所所友考上，但近期各部門又開始不重視，這很可惜。最好的方式就是恢復過去的『特考』，才能特用，也才可以形成專業的系統。」¹¹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在政府服務的經驗，也有助於自身的研究與教學，一位受訪者提及：「過去的研究讓我在政府『學以致用』，而在政府工作的經驗，讓我充分體會到政府部門間協調的重要性，參與政策制定的那種臨場感使得教學更有說服力，這就是學

10. 作者訪談，受訪者B，2018年6月27日。

11. 作者訪談，受訪者C，2018年7月18日。

術與政策完整的結合。」¹²此外，由於過去的歷史，東亞所對於政策研究向來不會偏廢，除對中國大陸發展深入的了解外，從近年來聘請具實務經驗的學者開設如「談判策略」、「策略規劃與管理」、「兩岸政策規劃」以及「區域經貿整合與談判」等課程，亦可看出東亞所在平衡學術研究與策略研究間所做的努力。

三、道路崎嶇、前途光明？

就此看來，「中國研究」對我國而言，不僅是專業學科或區域研究之辯，也涉及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分野。但兩者看似可以平衡但是否還面臨其他的挑戰？這不僅是東亞所的問題，也是台灣中國研究圈都須嚴肅面對的。我們認為有以下幾方面需要強化。

（一）強化與增加專業智庫

智庫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核心部分，諸如美國的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簡稱CSIS）、英國的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SIPRI）、日本的野村總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NRI）等知名智庫，不僅在本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且其所做的研究報告也具全球影響力。

就此觀察台灣，在相關領域中，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在1990年代之前一直是政府國際情勢與大陸政策的重要智庫，而東亞所也長期作為「準智庫」而存在，然而在全面與政治大學「接軌」後，東亞所全面回歸教學單位，而國關中心的角色也有待重新

12. 作者訪談，受訪者B，2018年6月27日。

定位。而在與政府關係密切的智庫方面，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兩岸遠景交流基金會等，雖然具有穩定、制度化的政策研析能力，但專職研究人員有限，多扮演匯集、整合相關學者的角色，而甫成立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之研析能量仍有待評估。此外，在政黨或民間智庫方面，能夠發揮的亦有限。如此，相較於對岸的涉台智庫而言，顯然有極大差距。¹³

因此，我國實有必要強化、增設相關智庫，一方面，可作為培養政務官的來源，在部分國家，尤其是美國，智庫往往也扮演培育政策人才，特別是政務官，或成為離任政務官發揮其實務經驗的場域，此即政府與智庫間人才流通的「旋轉門機制」（revolving door mechanism）。¹⁴另一方面，可明確區隔政策與學術的社群，此外，由於國內學術機構的職缺漸趨緊縮的狀況下，也可讓相關系所培養的碩博士人才可以「分流」至政策研究機構。

針對此，一位受訪者提出另一種方向：「美國有些大學的研究機構，雖然在大學裡，但政策研究做得很好，也不影響其學術聲譽，如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與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等，其實東亞所也可以朝這個方向，發揮所的專業做權威性的政策研究，也不影響在學術界中的地位。」¹⁵

13. 關於中共涉台智庫機構可參閱：朱雲漢、明居正、楊志恆（1997）、郭瑞華（2009）、蔡瑋（1997）與邵宗海、蘇厚宇（2007）等。

14. 「旋轉門」是美國智庫最具特色的現象之一。美國許多卸任官員，特別是政黨輪替後，會轉到智庫從事政策研究，而智庫的研究者也有不少到政府擔任要職，這種智庫學者、研究者和官員間的流通就是美國的「旋轉門」，此一機制使得智庫的輿論影響力滲透到政策制定的各個層面。以致許多智庫被稱為「影子內閣」、「美國的大腦」。

15. 作者訪談，受訪者B，2018年6月27日。

（二）培養政策人才

此外，另一個現實的問題是，若非待在「智庫」，有多少學者願意做偏向政策的研究？如同本文在一開始提及吳玉山教授所言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研究對台灣而言是「生死攸關的大事」，需要有實用性，前述表一也顯示，區域研究、政策分析與個案研究等確實對決策者較有助益。然而，對於剛入行的學者而言，是否有相關配套的機制讓學者從事「實用性」的研究，也是必須考量的。

就目前看來，一個明顯的現實是各大學的升等標準多以「學術表現」為主，以政大為例，在《國立政治大學教師聘任升等評審辦法》第十七條「教師升等評審項目及標準」中，研究項目標準皆是學術研究。¹⁶而到了學院、系所更是明顯，所有升等計分標準都是學術著作，如在東亞所所在的國際事務學院中，《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師聘任升等評審作業要點》的「升等研究項目計分方式」的「期刊文」分成三級：「排序第一級每篇40分、第二級每篇25分、第三級每篇15分」，等級越高之期刊學術「味道」越濃。在既有的升等壓力下，這也是為何年輕學者多不願投入政策研究之故。一位受訪者提及：「現在年輕學者做大陸研究已經沒有我們這一代的情懷與熱情了，但最大的問題還是他們沒有做政策研究的動力，這跟學術大環境有關，但做這麼多數據、量化研究，到底有沒有追求到『真理』？對國家實際需求有沒有幫助？這是值得考量的。」¹⁷

此一問題不僅出現在台灣，在美國亦然，Stephen Walt（2005）認為，學術界和決策圈內在的文化鴻溝日益增大，這很大

16. 包括：1.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2.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及應邀評論之質與量。3.著作獲得獎勵之質與量。4.主持研究計畫之質與量。5.其他研究成果。

17. 作者訪談，受訪者B，2018年6月27日。

程度是因為學術領域和外交政策制度的發展趨勢所致，其認為學術界的誘因結構和專業風氣發生了嬗變，而且作為聯繫學術和政策的傳送帶的「涓滴」模式（trickle-down model）被削弱了。Joseph Nye（2009）也認為此與整體的學術評價機制是相關的，因為年輕學者的刊登上專業學術期刊，或者被其他學者所大量引用而獲得好評進而有利於升等，其並不在乎使用清晰易懂英文或簡單的研究方法探究政策議題。

但對美國而言，此問題仍有補救的機制，根據賓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計畫」（UPENN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簡稱TTCSP）所公布的《2017年全球智庫發展報告》（The 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簡稱GGTTI），指出2016年全球共有智庫7,815家，美國是世界上智庫數量最多的國家，多達1,872家，其有足夠的誘因吸引對政策感興趣的人才，並對政策分析作出貢獻。而在此報告中，中國則以512家排名第二，且近年來在官方大力推動下，其智庫發展也有長足的進步（McGann, 2018）。故對台灣而言，若不能增加相關智庫，也無法提供誘因吸引新一代學者投入相關的實用性研究，將會使政策研究出現嚴重斷層，這是極為嚴重的國安危機。

（三）跳脫政治立場

對中國大陸以及兩岸關係的態度一直是台灣內部政治分歧的焦點或「斷層線」，民眾認同、政黨光譜、電視台平面媒體的識別都是以此為界，同樣地，這也影響了學術或政策研究的判斷。兩岸關係一直是「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在台灣與對岸的第一層賽局中無庸置疑是「政治」議題，不管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皆然，即使我方不戴政治眼鏡，北京對台政策無一不充滿政治性。而在第二層國內的部分，如前所述，當然具高度政治性，然也

正因如此，讓專業的政策專家能發揮的空間受限。一般而言，政策議題與政治議題不同的是，其具有更大的討論空間，透過多方行為者的參與對政策方案進行檢視，也正因此能強化政策主張和結果，並培養對紛爭問題的解決能力。但以台灣目前狀況看來，兩岸議題往往被導入「是與否」、「統與獨」的政治議題，少有轉圜的餘地，更缺少辯論的空間。這也是台灣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研究，特別是政策研究所面臨的問題。

針對此，一位受訪者提及：「台灣中國研究與其他國家比較起來還有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政治化』，很多研究不管是偏學術或政策，往往受政治立場或政黨因素所限制，即使研究者不受限制，外界也可能用政治的眼光檢視。」¹⁸東亞所同樣也面臨此問題，一位受訪者說：「由於歷史因素，本所過去都認為是『偏藍』，現在有些所友在民進黨、立場『偏綠』，這樣也很不錯。」¹⁹另一位學者也提及：「大陸研究涉及意識形態，會讓很多學者不願意涉入，若從國家利益、客觀的角度來看，應該鼓勵大家多參與。」²⁰

伍、結語

本文從學術與政策研究、區域研究與專業學科間的關係，探討東亞所創所迄今的發展與變遷。作為以中國大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區域研究所，與專業學科間一直存在著張力，而以「反共思想鬥爭人才」為創所目的，雖隱身在學術機構，卻是肩負著政策研究的使命。過去五十年以來，東亞所隨著自身內部的變化、台灣的中國

18. 作者訪談，受訪者C，2018年7月18日。

19. 作者訪談，受訪者A，2018年6月29日。

20. 作者訪談，受訪者B，2018年6月27日。

研究環境改變而興衰起伏，但肩負對訓練熟悉中國大陸研究人才、專業知識傳播，老師與所友以各種方式對政策的參與等一直沒有改變。然而，本文也點出東亞所乃至台灣中國研究所面臨的挑戰，包括專業智庫的不足、培養政策人才不易，以及此領域容易受政治立場影響等。

隨著中國大陸快速崛起、國際影響力大增，「中國研究」成為國際學術與政策界的顯學，此種發展對台灣有兩層意義。就學術而言，與大國相比，台灣社會科學規模偏小，不僅限制學術生產的總量，且降低研究與教學的平均品質，乃至於降低學術評量、學術領導與學術政策的性質，其中有政治、社會、經濟與學術歷史等複雜因素（黃樹仁 2007）。故在主客觀環境限制下，社會科學的發展絕不能全面鋪開，而是要找出具關鍵優勢且為國際所感興趣的領域，「中國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而在政策方面，如前所述，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的發展動態一直是影響台灣最為重要的外在因素，當初國際關係研究所與東亞所設置的目的也在於此，就此而言，我們累積了大量的知識與資訊；另一方面，台灣長期被對岸利用政經、社會、文化、宣傳、人員等方式滲透，在目前國際所熱烈探討的「銳實力」（sharp power）（Walker 2018）中，應可說是全世界最具經驗，也是最該總結經驗者，這都有賴中國研究學界的參與。因此，對台灣而言，不論從學術或政策，都應該要更加重視「中國研究」，這也是東亞所下一個五十年的責任所在。

參考文獻

一、中文

- Max Weber. 2014, 《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錢永祥譯，台北：遠流出版。譯自*Science and Politics: Selected Works of Max Weber(I)*. 2014. Max Weber. 2014. “Xueshu yu zhengzhi: weibo xuanji (I)”. Chien, Sechin Y. S. trans. Taipei: Yuan-Liou. Translated from *Science and Politics: Selected Works of Max Weber(I)*. 2014.
- 王信賢，2000，〈西方中國研究之新制度典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43（8）：23-46。Wang, Hsin-hsien. 2000. “Xifang zhongguo yanjiu zhi xinzhidu dianfan fenxi” [An Analysis on the Neo-Institutionalist 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China Studies]. *Mainland China Studies* 43 (8): 23-46.
- 王棟，2009，〈雙重超越的困境：中國國際關係理論與政策芻議〉，《國際政治研究》，3：12-28。Wang, Dong. 2009. “Shuangchong chaoyue de kunjing: zhongguo guoji guanxi lilun yu zhengce zouyi” [Overcoming the Dual Dilemma: A Discussion of Theory and Policy in Chine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Quarterly* 3: 12-28.
- 王緝思，2009，〈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相脫節的癥結與出路〉，《國際政治研究》，3：1-11。Wang, Ji-si. 2009. “Xueshu yanjiu yu zhengce yanjiu xiang tuo jie de zhengjie yu chulu” [How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Scholarly Research and Policy-oriented Studies in I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Quarterly* 3: 1-11.
- 朱雲漢、明居正、楊志恆，1997，《中共對台智庫角色之研究》，台北：行政院陸委會。Chu, Yun-han. Chu-cheng Ming, and Chih-heng Yang. 1997. *Zhonggong duitaizhiku jiaose zhi yanjiu* [The Research of the Role of China's Think Tank toward Taiwan]. Taipei: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 朱鋒，2009，〈學術性的政策研究：路徑與方法〉，《國際政治研究》，3：29-39。Zhu, Feng. 2009. “Xueshuxing de zhengce yanjiu: lujing yu fangfa” [Academic Studies of Policy: Pathways and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Quarterly* 3: 29-39.
- 吳玉山，2000，〈政治與知識的互動：台灣的政治學在九零年代的發展〉，何思因、吳玉山主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學》：3-48，台北：中國政治學會。Wu, Yu-shan. 2000. “Zhengzhi yu zhishi de hudong: taiwan de zhengzhixue zai jiuling niandai de fazhan” [The Interaction of Politics and Knowledge: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Taiwan in the 1990s].

In *Mai ru ershiyi shiji de zhengzhixue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3-48, eds. Szu-Yin Ho and Yu-Shan Wu. Taipei: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吳玉山，〈紀念中國大陸研究的創建者、東亞所創所所長吳俊才先生〉，*《東亞研究》*，48（1）：100-103。Wu, Yu-shan. 2017. “Jinian zhongguo dalu yanjiu de chuangjianzhe, dongyasuo chuangsuo suozhang wu juncai xiansheng” [Commemorating Dr. Chun-Tsai Wu, the Founder of Mainland China Studies and the First Direct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East Asia Studies* 48 (1): 100-103.

李英明，1995，*《中國大陸學》*，台北：揚智文化。Lee, Ying-ming. 1995. *Zhongguo daluxue [Sinology for Mainland China]*. Taipei: Yang-Chih.

邵宗海、蘇厚宇，2007，*《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共決策機制：中共中央工作領導小組》*，台北：韋伯文化。Shaw, Chong-hai, and Hou-yu Su. 2007. *Juyou zhongguo tese de zhonggong juece jizhi: zhonggong zhongyang gongzuo lingdao xiaozu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entral Leading Small Group]*. Taipei: Weber.

張志洲，2009，〈國際關係中國學派的進路：兼論國際問題研究的政策性與學術性〉，*《國際政治研究》*，3：74-79。Zhang, Zhi-zhou. 2009. “Guoji guanxi zhongguo xuepai de jinlu: jian lun guoji wenti yanjiu de zhengcexing yu xueshuxing” [The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cy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Quarterly* 3: 74-79.

郭瑞華，2009，〈中共對台工作機制研究：政府過程觀點〉，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Kuo, Jui-hua. 2009. *Zhonggong duitai gongzuo jizhi yanjiu: zhengfu guocheng guandian [A study on the Taiwan affairs mechanism of the CPC: “Process of Government” perspective]*. Taipei: Ph. D. diss.,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陳至潔，2016，〈建構相互主觀的想像體：剖析冷戰起源時期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及其中國研究(1953-1975)〉，*《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8（1）：61-104。Chen, Titus C. 2016. “Jiangou xianghu zhuguan de xiangxiangti: pouxi lengzhan qiuyuan shiqi de guoji guanxi yanjiusuo ji qi zhongguo yanjiu (1953-1975)” [Constructing an Inter-Subjective Imaginability: Analyzing Taiwan’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China Studies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1953-1975)].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8 (1): 61-104.

陳德昇、陳欽春，2005，〈兩岸學術交流政策與運作評估〉，*《遠景基*

- 金會季刊》，6（2）：35-82。Chen, Te-sheng, and Chin-chun Chen. 2005. "Liang'an xueshu jiaoliu zhengce yu yunzuo pinggu" [Assessment Regarding the Policy and Practice of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Prospect Journal* 6 (2): 35-82.
- 曾永賢、張炎憲、許瑞浩、王峙萍，2009，《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台北：國史館。Tseng, Yung-hsien, Yen-hsien Zhang, Jui-hao Hsu, and Chih-ping Wang. *Cong zuo dao you liushi nian : Zeng yongxian xiansheng fangtan lu* [From Left to Right over 60 Years: Records of Interviews with Mr. Yung-hsien Tseng (1940s-2000s)]. Taipei: Academia Historica.
- 黃樹仁，2007，〈小國的學術困境：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教學與評量的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5：117-180。Huang, Su-jen. 2007. "Xiaoguo de xueshu kunjing: Taiwan shehui kexue yanjiu, jiaoxue yu pingliang de fansi" [The Predicament of Small Nation: A Reflection on Research,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in Taiwan's Social Sciences].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65: 117-180.
- 楊開煌，〈台灣「中國大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東吳政治學報》，11：71-105。Yang, Kai-huang. 2000. "Taiwan zhongguo dalu yanjiu zhi huigu yu qianzhan" [Self-Examination for "China Studies" in Taiwan].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71-105.
- 褚填正，2017，《當代中國學在臺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的肇基與嬗遞（1968-2015）》，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Chu, Tien-cheng. 2017. *Dangdai zhongguoxue zai taiwan: Zhengzhidaxue dongya yanjiusuo de zhaoji yu shandi (1968-2015)*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 Taiwa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68-2015)]. Taipei: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TU. Th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and Cross-Taiwan Strait Relations.
- 劉曉鵬，2013，〈敵前養士：「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前傳，1937-197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2：145-174。Liu, Philip Hsiao-pong. 2013. "Diqian yangshi : guoji guanxi yanjiu zhongxin qianchuan, 1937-1975" [Assembling Scholars in the Face of the Enemy: The Prequel to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7-1975].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82: 145-174.
- 蔡瑋，1997，〈中共的涉台學術研究機構〉，《問題與研究》，36（4）：29-43。Tsai, George W. 1997. "Zhonggong de shetai xueshu yanjiu jigou" [Beijing's Research Institutes on Taiwan Affairs]. *Issues & Studies* 36 (4): 29-43.

二、英文

- Almond, Gabriel A., and Stephen J. Genco. 1977. "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29 (4): 489-522.
- Caplan, Nathan. 1979. "The Two-Communities Theory and Knowledge Utiliza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2 (3): 459-470.
- Goldman, Emily. 2006. "Closing the Gap: Networking the Policy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Asia Policy* 1: 16-24.
- Jentleson, Bruce W. 2002. "The Need for Praxis: Bringing Policy Relevanc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 (4): 169-183.
- Jordan, R., D. Maliniak, A. Oakes, S. Peterson, and M. J. Tierney. 2009. "One Discipline or Many? TRIP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in Ten Countries." https://www.wm.edu/offices/itpir/_documents/trip/final_trip_report_2009.pdf (Accessed on September 18, 2018).
- Kou, Chien-wen. 2014.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aiwan's China Studies: Trajectories and Dynamics." *Issues & Studies* 50 (1): 9-53.
- Lepgold, J., and M. Nincic. 2001. *Beyond the Ivory T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Issue of Policy Relevanc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ieberthal, Kenneth. 2006. "Initiatives to Bridge the Gap." *Asia Policy* 1 (1): 7-15.
- Lieberthal, Kenneth. 2010. "Reflection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a Field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 266-277, eds. Carlson, A., M. E. Gallagher, K. Lieberthal and M. Man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Gann, James G. 2018. "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2&context=think_tanks (Accessed on October 23, 2018).
- Nye, Joseph. 200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levance of Theory to Practic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48-660, eds. Reus-Smit, C., and Snidal, 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Brien, Kevin J. 2011.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in an age of special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 (71): 535-541.

- Shambaugh, David L. 1993.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NY: M.E. Sharpe.
- Stone, Diane. 2007. "Recycling Bins, Garbage Cans or Think Tanks? Three Regarding Policy Analysis Institut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85 (2): 259–278.
- Walder, Andrew. 2004.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1977-2002." I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314-340, eds. Szanton, David L.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lker, Christopher. 2018 "What Is 'Sharp Power'?" *Journal of Democracy* 29 (3): 9-23.
- Weaver, R. Kent. 1989. "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22 (3): 563-578.
- Walt, Stephen M. 200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8: 23-48.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3.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From Thought to Policy: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Shaping Government Strategy; Experiences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N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聯絡作者：王信賢、趙春山

聯絡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政大東亞所）；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驚聲大樓T810室

電子信箱：eastasia@nccu.edu.tw；vicilichao@hotmail.com

收稿日期：2018/09/19

審稿通過：2018/10/23

責任編輯：高士元 鄧峻丞 宋淳暄 何育墉